

第一章

近代中美文化关系

概 述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在清末王朝和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下，中美文化关系基本表现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美国文化向处于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带有强制性的单向输入。所经渠道主要通过美国教会在中国传教、设医院、办学校、吸引和接受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深造。

这时期中美文化关系的发展，经过了复杂曲折的历程。美国取得独立（1783年）之初，中美两国人民曾经通过和平通商有过最初的往来。1784年美国商船首航广州就有美国商人、冒险家和海员来中国，由于美国文化远落后于欧洲，早期来华的美国人大多只是赞美中国的古代文明，带了些艺术品回去。稍后的1795年，中国也有些木工和海员漂洋赴美。但这些人的社会构成和文化程度都不足以成为中美

文化联系的使者。1830 年美国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到广州传教。鸦片战争之后,1844、1868 年,美国先后通过与中国签订《望厦条约》、《蒲安臣条约》,迫使清政府接受了有关美国人在中国传教和传教受到保护的条款。19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 美国在华传教活动初奠定基础;从 60 至 80 年代,由于美国内战的影响,美国在华传教活动一度陷于停滞,此后至 20 世纪初则进入迅速发展阶段。传教士传教的目的在于通过十字架和《圣经》征服中国,以实现教会和美国的利益^①。但教会为扩大传教的影响,采取了办学、办医院、办报刊等手段,传教士也就成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教会学校的课程是宗教的经书、教义,西方传统的科学知识也是教会学校的必修课程之一;教会医院自命从事教会“慈善”事业,也把西医、西药和医院制度介绍进来;教会报刊宣传宗教教义,同时也讲些科学知识。这些都在客观上起到了中美文化交往的作用。与此同时,在传教士资助下,容闳等 3 人赴美留学,继而有 1872 至 1875 年的 120 名幼童分四批赴美留学后由于美排华激起国人愤慨等原因,导致 1881 年分三批提前召回。大规模的吸引和接受留美学生,则是 20 世纪初的“庚款留美”其实质正如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所指出的“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②。仅 1909 至 1917 年,用庚款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即达 853 人。但这些留学生在美国接触到一个广阔的世界,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有真切的认识,这使他们有可能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者。

近代时期中美之间这种单向的、扭曲的、所谓“挑战——应战”的文化接触的形式,常常表现为“来而不往”或“有来无往”实际谈不上“交流”。这种文化关系,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古典文化交流显然是不

① Arthur H.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New York: F. H. Review Co., 1907), p. 236.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06 页。

同的。中国在西方炮舰包括美国炮舰的威胁下，被迫接受了它们的商品，也被迫接受了西方和美国的文化。近代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门户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在西方和美国的冲击下“逐渐解体、蜕变和转向现代化的复杂而痛苦的过程”^①。

本章包括《美国传教士与中美文化交往》、《庚款留美与中国现代化》两节内容，可以反映这种复杂而艰辛的历程。

第一节 美国传教士与中美文化交往

从 1830 年 2 月第一个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来华，到 1949 年 8 月司徒雷登离开南京，100 多年中，大批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介绍到中国。他们在华创办学校，编译出版书刊，创办医疗卫生事业。传教士的文化活动，自然属于文化侵略的性质，但也在客观上传播了近代美国文明，促进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在中美文化交往中起了某种桥梁作用。

一、创办教会学校 以教育传教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784 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才开始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接触。但到 19 世纪初，美国对华贸易已居第二位，仅次于英国。为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美国基督教差会决定向中国“传播福音”。1830 年，美国的一个基督教差会美部会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裨治文来华前，差会发

罗荣渠：《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631 页。

给他一封长篇指示信，要求他积极、机智和忠诚地对中国人进行传教信中说：“终有一天，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利，它那众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此后美国的浸礼会、圣公会、美以美会等都先后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从 1830 年到 1848 年，各国新教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共计 98 人，美国有 73 人。但总的看，由于英国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较早，19 世纪，英国势力占主导地位，其传教士约占全体在华传教士的 50%。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国势力迅速增强，到 1914 年，美国在华传教士超过英国，美国在华传教士占在华传教士总数的 60%。

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就是要传播基督教义，企图实现中国的基督教化，把中国纳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体系，进而和平征服中国。正如 19 世纪来华的传教士明恩溥所说：“我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界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收回利益。”^①

由于清政府禁止传教，早期来华传教士讲经布道、传播福音、发展教徒的工作进展缓慢。裨治文在广州活动了 17 年之后，这里才有了基督教徒。美以美会传教士入华 10 年，才发展了一名教徒。公理会 1847 年进入福州，1856 年才有了第一位信教者。1846 年入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70 年代前一直忙于巡回布道，每到一地都对当地群众宣讲圣经，发放各种宗教小册子。他在给国内差部总会的一封信中报告了传教活动的困难：“我们每人雇一头驴驮着我们的行李和书籍，而我们自己则步行走街串镇，在街头宣讲福音。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先后在 190 个村庄里布道……我们得花相当长的时间招揽听众。有一次我费了好大劲也没有找到一个人听讲。很多人看见了我们，但只匆匆走过，并不停下来。一个男孩大着胆子询问我们从哪

明恩溥：《今日中国与美国》（Arthur Henderson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New York: F. H. Review Company, 1907），第 236 页。

里来，但立刻受到旁边干活的一个男子的训斥。我和助手坐下来等了半个小时，最后只好转向其他村子。^①

传播福音步履艰难使传教士们很快就发现，由于他们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差距实在太大，传播福音不能引起中国人的共鸣，而办学则是传教最强有力的手段。正如 1854 年入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斯所说：教会学校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传教方式”^②。

美国传教士率先在华办起了教会学校。第一所学校是 1830 年 2 月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贝满学校，只收了四五名学生，且举办不久即关闭，但它开创了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办学的历史。1836 年寓居广州的外侨组织为纪念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创办了马礼逊教育会，由美商奥立芬赞助，裨治文任秘书。裨治文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认为“教育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海陆军力量、最繁荣的商业刺激以及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③。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后，即向美国发出呼吁，要求派遣教师前来中国开办学校。美国耶鲁大学马上作出反应，派该校毕业生布朗来华。1839 年，马礼逊学堂正式开学，首批学生 6 人，1842 年迁到香港，学生逐渐发展到三四十人。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由于洋务运动逐渐兴起，迫切需要西学知识和人才；1868 年美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传教受到保护，打开了美国传教士自由无阻地进入中国传教与办学的道路；60 年代末，美国又掀起了“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传教士被派往国外去传教。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大大增加。1868 至 1898 年，美国派往海外的传教士共

① 菲舌尔：《狄考文在中国山东传教 45 年》（Daniel Fisher, Calvin Wiln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rany in Shantong, China）（Philadelphia, Penn. : Wiseminder Press . 1911）第 105 页。

② 倪维斯：《中国和中国人》（John L. Nevias, China and Chinese, New York），1869 年 第 342 页。

③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36 年 12 月。

达 8000 多人，其中有 2500 人被派到中国，致使美国在华无论是传教、办学校，还是办慈善事业方面都居西方国家之首。据统计，到 1898 年，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已拥有 155 个教会，849 个分会，40027 名中国教徒。开办 1032 所初等学校，有学生 16310 人；有 74 所中等以上学校，拥有学生 3819 人^①。比较著名的有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设的蒙养学堂（1876 年改为文会馆）；1865 年圣公会在上海开设培雅学堂，第二年又开设度恩学堂，1871 年合并成立上海圣约翰书院，1894 年发展为圣约翰大学；1875 年圣公会在武昌开设文惠廉纪念学堂；1881 年监理会在上海开设中西书院；1882 年长老会在山东开设广文学堂；1889 年长老会在广州开设格致书院；1888 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开设汇文书院，1889 年公理会在通州开设华北协和书院。此外，还开办有北京贝满女塾（1864 年）、上海圣玛利女学（1881 年）、广州真光女学（1881 年）以及上海中西女学等等。

20 世纪初，教会大学特别是美国在中国所办的教会大学得到迅速发展。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第一，清政府 1901 年颁布《学堂章程》，改书院为大学，增设西学科目。教会为了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占主导地位，也纷纷建立大学，以同中国公私立大学竞争。第二，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使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根治中国老百姓的“排外情绪”，就必须争取中国的文人学者、知识阶层，就必须发展高等教育，输送更多的人到社会各个关键部门。第三，美国一向重视通过办学这种方式以“占领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正好乘机大力发展教会教育。

比较重要的大学有：苏州东吴大学（1901 年）、武昌文华大学（1903 年）、广州岭南大学（1904 年）、圣约翰大学（1905 年）、华北协和大学（1905 年）、由广文学堂发展成的齐鲁大学、由汇文书院和华北协和书院合并成的燕京大学，等等。当时，中国所办大学十之八九是教会创办的。据统计，1889 年，基督教在华所办大学的学生人数为 16836 人，到 1920 年增加到 245049 人，增长了 13.56 倍。

^①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4 页。

1922 年以后，由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和发展，特别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教会学校势力受到打击。三四十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扶持，美国教会学校又得到迅速发展。

美国传教士除直接在中国开办学校外，还将教会教育渗透到清政府官办教育机构。1862 年在北京开设的同文馆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新式学堂，也是最高学府。同文馆名义上虽然是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实际上却被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所操纵。1865 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到同文馆英文班任教习，1869 年 11 月，又出任同文馆总教习，一直到 1894 年，1898 年又当上了京师大学堂总练习，一直到 1900 年。丁韪良前后任职这所高等学府达 32 年之久。

教会教育是移植到中国肌体上的异物。这种文化移植在外国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中美文化交流是单向的，即美国向中国输出基督教文化。但是，文化侵略不同于枪炮战争，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总是相互渗透，错综复杂。就教会教育本身来说，它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新的科学文化知识。

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有利于西学的介绍。中国旧式教育偏重于科举，讲求进身之道，学生所学科目皆封建纲常，对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没有直接作用。而传教士所开办的教会学校，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传播近代西方科学。如布朗夫妇任教的马礼逊学堂，教学内容包括基督教教义、各种近代西学知识和古代汉语。除古代汉语由一位中国先生任教外，其他各门课程皆由布朗夫妇任教。布朗夫妇不仅给学生灌输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等西方知识，而且还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容闳等留学美国的促成者。1846 年布朗夫妇回国时，容闳、黄宽、黄胜三人随同赴美。容闳后来考上耶鲁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留学生。黄宽赴英国就读于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留英学生和中国第一位西医的传播者。又如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于 1881 年在上海开设中西书院，八年

的西学课程循序渐进,高年级的课程有化学、重分、微分、积分,还有航海测量、天文测量等等。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所办的登州文登会馆,九年学制中,设有数学、地理、代数、测绘学、化学、动植物学、天文学等课程。他还在1896年“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作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的报告,把课程列为六种:语文、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并认为开设西学课程可以使教会有声望。特别是教会大学,有些与美国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耐尔大学等有联系,直接把美国大学的院系设置、课程安排移植到中国来,有利于西学的传播。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创设的农学院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及对水稻、小麦等品种的研究,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对西医学的传播,燕京大学对新闻学的研究,圣约翰书院的工商管理,等等,都在西学传播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教会教育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的上海同文馆、1864年的广州同文馆的创设。以后,清政府又陆续开设了一些工科学校和军事学校。这些官办新式学校的开办与传教士的影响不无关系。有许多传教士就担任了这些学校的教习或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任职期间,进行教育改革,逐渐引进了算学、化学、国际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新课程。这些教育内容后来逐渐为中国教育所接受。

有些传教士还利用和清政府官员的接触或舆论工具,促进中国教育改革。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拜会恭亲王奕訢时,曾面呈《创设学校议》,论述学校的重要,并介绍了新学的种类及设立新学的方法,还提出改革学制和考试制度。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利用他主办的《万国公报》发表多篇文章,批评中国旧的教育制度,认为“中国人才之不振,由于教化之不兴”主张中国应改革科举并兴新学,在现有书院设天文、舆地、格致、船政、法学等学科。狄考文在《振兴学校论》一文中,批评中国学校教授的内容太窄,不适应社会发展,主张广设普通学校

和职业学校,开办大学和女学,把中国的士、农、工、商纳于学。狄考文还主张废除科举制度,代之以西方学校授予学位的方法。20世纪初,清政府明令废八股、停科举、开新学,虽然是客观形势所迫,与传教士的活动、宣传和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教会学校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传教士们在办学过程中,同时也认识到,如果教会学校仅仅传教,同样引不起中国学生的兴趣。美国传教士狄考文1864年在山东登州开设蒙养学堂,到1872年,共招收九届学生,85人,而学满六年的只有4人;先后皈依基督教的有14人,到1872年已有5人背道。这样的教训使狄考文认识到:举办教会学校,必须给中国人智力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教育,“这些学校传播西方的科学和文明,必不可少地要在物质上和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善果”^①;基督教教育决不能排斥科学,科学要成为宗教的盟友。狄考文的观点后来逐渐地被传教士们所接受,成为在华传教士传播西方文明的一个指导性原则。这样,在传教士的教会学校里,一批初步接受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美国传教士卜舛济经营的圣约翰大学培养了大批商业管理人才。据1926年统计,该校有158名毕业生在商界任职,占毕业生总数的58%。司徒雷登经营的燕京大学从1917年到1936年培养了400多名教育界人才。美国传教士布朗是中国近代留学活动的最早促成者。在他的帮助下,容闳赴美学习,学成回国后,积极设计并推动选派青少年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从1872年第一批幼童赴美,到20世纪初中国形成“留学潮”,成批成批的留学生接受了近代文明。他们无论是在科技、文化或政治方面,都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狄考文:《基督教教会与教育的关系》(1877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大会上的报告)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二、编译和出版书刊杂志 以文字播道

编译和出版是传教士在华的重要文化活动。他们认为“文字播道”比创办学校影响更为广泛，收效更为显著；同时，传教士要把在中国了解到的情况、信息和动态提供给本国，作为侵华的参考。这些是他们从事编译和出版活动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报刊和书籍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编辑报刊方面。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最早的刊物是英文期刊《中国丛报》。它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倡议，由美国公理会提供的印刷机和活字机，美商奥立芬提供开办费用并拨给一所楼房作为编辑印刷之用的基础上创办的。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负责编辑，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被指定为该报的印刷人和发行人（后来也参加编辑）。

《中国丛报》从 1832 年 5 月创刊，到 1851 年 12 月停刊，前后连续出版 20 年 发行刊物 20 卷（每月一期，每年一卷）。裨治文在创刊号上指出了该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出版《中国丛报》，广泛了解中国的各种情况，包括气象、土地、江河海的生产等自然资源；了解中国商业的过去和现在，考察商业状况的利弊；了解中国的社会关系，如统治者与百姓、丈夫与妻子等等。因而，《中国丛报》辟有名录繁多的栏目，有宗教消息、书评、文艺杂谈、时事日志、近代中国介绍、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等等。

从内容上看，《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 20 年间处在激烈动荡和急剧变化之中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历史、地理、文化、气象等等。尤其是它特别重视报道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记载了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译载了许多如清帝上谕、大臣奏折等重要文件，为研究鸦片战争前后 20 年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开端和早期中外关系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此外，《中国丛报》还翻译和介绍了中国历史、宗教、农业、儒家经典和文学艺术作品等对

中外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桥梁作用。

《中国丛报》主要发行对象是欧美各国政府和商业团体及在外的外侨，还有在南洋活动的传教士等。《中国丛报》搜集了大量关于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提供给资本主义各国参考。《中国丛报》还提出各种政治主张，煽动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如它长期鼓吹对清政府使用强硬政策，煽动以武力入侵中国。1834年12月，在广州的全体英侨呈英国国王书，要求派军队和军舰来华，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开辟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公开表示支持说：“我们衷心希望他们能达到他们所提出的全部要求”^①。一个月后，裨治文又说：“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②

美国传教士嘉约翰1868年在广州编辑发行《广州新报》。这是最早用汉文向中国介绍西医西药的刊物，每周出版一期，1884年改为月刊，更名为《西医新报》。1887年，嘉约翰又为新成立的中华博医会创办《博医会报》，分中英文两种文字出版。这份期刊是19世纪末在中国出版的惟一的西医学学术刊物，对于了解当时的疾病分布和教会医生的活动，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19世纪下半期，在传教士主办的刊物中，影响最大的是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万国公报》前身是《教会新报》，以林华书院名义在上海刊行，自1868年9月起，每周一期。《教会新报》是宗教性刊物。林乐知在发刊词中阐明了它的宗旨是：为了加强教徒之间的联系，同时向教外作宣传。由于《教会新报》宗教色彩浓厚，内容狭窄，读者有限。从70年代起，它陆续刊载非宗教性内容，并于1874年易名为《万国公报》，成为一份宗教、政治、社会和科技的综合性期刊。1883年，因林乐知忙于创办中西书院和其他活动，《万国公报》停刊。1887年，广学会创立，林乐知被推举为理事，《万国公报》复刊，成为广学会

①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34年12月。

②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35年1月。

机关刊物，每月一期，林乐知任主编，直到 1907 年因林乐知病逝停刊前后出版达 34 年之久。

从内容上看，《万国公报》刊载范围较广。首先它以比较大的篇幅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成果。林乐知认为，这样做有助人们消除对基督教的“无知”和“偏见”。如从第四期开始刊登丁韪良的《格致入门》连载 9 个月。它还刊登了广学会、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方科技著作。1871 年 2 月至 4 月刊载了艾约瑟的《格致新学提纲》列举了 1543 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发表以来 300 年间西方科学的重大发现和发明。同时，《万国公报》也重视介绍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的历史和现状。如刊登美国、法国总统选举，英国议会制度等消息；介绍欧美的教育制度、新闻事业、图书馆设置、社会救济工作等等，对开阔人们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万国公报》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到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刊物。此外，《万国公报》还提出各种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主张。政治方面，主张兴民权、设议院等；经济方面，配合当时的洋务运动提出造机器、开煤铁矿、建银行、设商部、举办邮政、奖励发明等；教育方面，主张创办新式学校、改革学制等。

在《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上林乐知费力最大的是力图从“理论”上调和基督教教义和中国的儒家思想。1869 年底至 1870 年初，林乐知发表长篇文章《消变明教论》，详细论证基督教关于人性和道德规范的训言与儒教“有相通无相背”。文章历引《圣经》证明：“儒教重五伦，吾教亦重五伦”；“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儒教君子三戒与吾教上帝七戒，皆有相同者”。结论是“耶稣心合孔孟者也”。1870 年至 1871 年，林乐知又发表十几篇文章，认为儒家“道不可离”、“学而时习之”、“推己及人”等格言与耶稣教“不甚有别”，甚至“与耶稣教同”；“与耶稣教合”。林乐知努力探讨基督教教义同儒家思想的一致性，目的就是想缓和两种思想接触而产生的冲突，使基督教教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架下取得一席之地。这种比较虽显得牵强，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万国公报》初刊时印数很少，销量不大。直到1894年因刊载甲午战争的消息和评论才引起士大夫们和上层官吏的重视，销路陡增。据统计，《万国公报》的销售量1876年为1800份，到1897年增至5000份，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时增至8.4万份。《万国公报》对中国维新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活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受到《万国公报》的影响。1882年康有为途经上海时，曾订阅《万国公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大量议论有不少直接来自《万国公报》。其他如谭嗣同、翁同龢以及光绪皇帝等，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

在翻译和出版书籍方面。早在1834年11月，在广州的外侨就成立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该会标榜的主要宗旨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播给他们”。1838年，“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出版了编译的《美利哥合省国志略》（初版署名高理文，后经修订，书名改称《亚美利驾合众国志略》第三版改为《联邦志略》署名裨治文）向中国初次介绍了美国的地理、历史等一般知识，并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来源、组织与功能作了扼要叙述，是以后三四十年间中国人了解美国情况的主要来源。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增补的有关美国材料，三分之二来自该书。梁廷枏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介绍美国的专著，书中资料来源以该书为主要依据。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也曾参考过该书的早期版本。

1839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受林则徐委托，参加编译瑞士人瓦达尔1785年编著的《各国律例》（全名是《国际法运用在行为和民族与主权事务的自然法则的原则》），这是国际法被介绍到中国的开始。

鸦片战争后，大批西书在中国被翻译和出版，美国传教士起了重要作用。

自然科学方面的有：1866年丁韪良编纂刊行了《格物入门》，这是一部介绍西方科技的书，分力学、水学、气学、地学、电学、化学、测算举偶等七卷。70年代到80年代，林乐知与中国学者郑昌棫合作，

翻译了《格致启蒙》共有化学、地理、天文、格物四卷由江南制造局刊行。丁韪良与同文馆学生胡玉麟等合编《格物测算》共八卷，其中三卷为力学，其余各卷为水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由同文馆刊行。除上述综合性科技读物外，传教士们还译出了不少基础性、理论性科学书籍。如美国传教士玛高漫的《地学浅释》（1871年版）影响较大。

西医西药方面：罗孝全 1850 年用中文写了一本《家用良药》的西药书，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介绍西医西药的最早出版物之一。1853 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嘉约翰编译西医西药书籍达 34 种。主要有：《西药略释》、《眼科撮要》、《割疾全书》、《炎症》、《裹扎新编》、《内科阐微》、《皮肤新编》、《内科全书》、《实用化学》等全面介绍西医内、外、眼、皮科等科学知识。西医西药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对引进传播西医西药知识，培养西医人才产生了积极作用。

社会科学方面的有：丁韪良 1862 年到上海后，开始翻译《国际法基本原理》（1836 年美国初版，作者为美国著名律师、外交官惠顿），后经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推荐，得到清政府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的同意，派章京陈钦、李常华、方浚师、毛鸿图 4 人“悉心商酌册润”，并拨银 500 两交付京都崇实印书馆刊刻，于 1866 年问世。书名为《万国公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完整的国际法著作。继《万国公法》以后，丁韪良又和他们合作或单独翻译、编纂了《星轺指掌》、《公法便览》、《法令会通》、《陆地战役新编》、《中国古代万国公法》等国际法著作。林乐知 1867 年就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到 1883 年解聘。翻译的社会科学书籍有：《印度国史》、《俄罗斯国史》、《德国史》、《欧罗巴史》、《万国史》、《东方交涉记》等。1887 年，林乐知到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任理事。他在广学会出版的译作有：《中东战纪本末》、《中西关系略论》、《治安新册》、《列国岁统政要》、《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等。《中东战纪本末》刊载了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大量原始资料，书中附有多篇传教士撰写的政论文章，出版后风行一时。

传教士在华编辑和出版的刊物、书籍，作用是明显的。第一，加速

了西学的传播。传教士所办的报刊，大篇幅介绍西学，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带动了中国人民了解世界，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翻译出版的西学科学技术书籍，大大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轻视科学的观念，特别是西方科技的输入，突破了长期以来中国科技的直观经验和笼统意想的局限。第二，为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来源。如康有为在他的《公车上书》中所提的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内容与《万国公报》所证相合。梁启超提出的‘育人才’、‘开学校’、‘变官制’等主张也受到《万国公报》的影响。光绪皇帝还向西方订购了 89 种书籍，“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①。

三、举办‘服务’事业 为传教铺路

传教士举办的社会服务事业主要有医疗事业和慈善救济事业。教会和传教士都认为，传播医学等实用科技，能消除中国人民对基督教的反感，从而为传教铺平道路。

美国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是伯驾，他于 1834 年来华，1835 年就在广州设立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设的第一所西医医院。眼科医局开业仅六个星期，就接待了 450 人看病，博得了广州一些老百姓的好感。伯驾还间接地为林则徐治过病。1847 年，伯驾利用美国医生斯普纳和杰克逊寄赠的含硫乙醚和麻醉器材，在中国首次使用麻醉剂为一个 35 岁的病人割除了右臂上生的脂肪瘤，获得成功。这种新麻醉剂的使用，在中美科学交流史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900 年以前，美国在华医疗事业的规模较小，主要有：美国长老会在广州开设的博济医院（1859 年）、夏葛妇孺医院（1896 年）、柔济医院（1899 年）、大美浸礼会在汕头开设的盖世医院（1881 年）、公理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22 页。

会在通州开设的通州医院（1886 年）北长老会在上海开设的同仁医院（1867 年）、浸礼会在上海开设的西门妇孺医院（1885 年）基督会在南京开设的鼓楼医院（1883 年）、监理会在苏州开设的博习医院（1883 年）、美以美会在九江开设的生命活水医院（1892 年）等约 30 余所医院。

最著名的是博济医院，它是由美国传教士嘉约翰于 1859 年创办的，嘉约翰任院长长达 40 年，直到 1899 年。中国第一个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的医学博士黄宽经常帮助嘉约翰施行手术和会诊，并参加该院培养中国学生学习西医的教学工作。

博济医院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士人才以及在医院管理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在中国医疗事业上有较大的影响。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 74 万人次，住院病人 4 万人次，为近 5 万余病人做过外科手术。嘉约翰翻译出版了《种痘书》、《西药略释》、《眼科撮要》、《创症全书》、《炎症》、《化学初阶》、《卫生新编》、《内科全书》、《体质穷源》等西医西药书籍 34 部。1868 年，嘉约翰在广州编辑发行主要介绍西医西药的中文周报《广州新报》（1884 年更名为《西医新报》月刊）。这是最早在广州发行的科学性中文周报。1887 年嘉约翰还创办了《博医会报》分中英文两种版本，这是 19 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的惟一的西医学学术刊物。

1866 年，博济医院还开设了华南医学校，1887 年又在香港开设了正规化的医学院，培养了 150 多名西医人才，他们毕业后大都在广州和华南各省行医，对传播西医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起到积极作用。

进入 20 世纪以后，传教士更加注重发展医疗事业，除对原有的医院扩大规模外，又在各地新设了不少医院和诊所。据 1938 年出版的《基督教差会世界统计》资料所载到 1937 年止，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的医院共有 300 所，病床 2.1 万张，另有小型诊所约 600 处。其中属于美国经营的医院有 140 所，病床 1 万张，加上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北京直接投资经营的协和医院和医学院，以及美国天主教在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开设的一些医院，美国在华医疗事业在世界各

国中占据了优势。

传教士在中国举办医疗事业在客观上把西方的医术和西药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包括护理教育）传入了中国。特别是 20 世纪后，在华主要教会大学都先后设置医学院，多数教会医院都附设护士学校，为中国培训出一大批西医和护士，中国早期大部分西医人才都出自教会医学院校。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慈善事业规模较小，主要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武昌、长沙、兴化和烟台等地办了一些慈幼机关，收养一些孤儿，从小就向他们灌输宗教教义，同时也为教会提供无偿劳动。这也是传教士在中国推行文化侵略的一部分。

除医学外，传教士还把其他一些实用科技带到中国。如美国传教士梅理士曾在山东推广种植从美国带来的花生品种，使山东花生在产量和质量上有所提高。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倪维斯曾介绍过若干西洋果树品种到烟台。他在烟台买了十几亩地，招收若干工人，一面从事开垦种植，一面学习果树栽培技术。他们还栽培了许多果树幼苗，无偿提供给附近的农民。

传教士向中国进行文化和“道义”渗透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组成各种团体，以集中力量推进传教事业。1856 年，上海外侨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上海文理学会，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任第一任会长。它的宗旨是考察中国的社会，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向欧美介绍中国的学术成果，接待各国学者的来访或考察，出版学会年刊，创办图书馆和博物馆等。

传教士的基督教组织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是 1844 年由英国人乔治·威廉斯在伦敦创立的一个以建立和开展社会福利及服务工作为特点的基督教外围组织，约于 1851 年传入美国，1853 年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

基督教青年会在欧美国家产生后不久，就被介绍到中国。1876 年，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1885 年，福州英华书院和通州的潞河书院先后有了学校青年会。1890 年，杭州泓道女校建立了第一个女